

## 文史哲研究：重识·省思·重构专题研究

### 特邀主持人：张晶

张晶，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美育与文明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辽金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育联盟副主席、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等职。主要致力于古代文论、文艺美学等学术研究领域。出版有《美学的延展》《艺术美学论》《神思：艺术的精灵》《辽金诗史》《辽金元诗歌史论》等十余部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哲学研究》《文艺研究》《现代传播》《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百余篇。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特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及以上优秀成果奖二十余项。



**主持人语：**今天的知识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概念的生产。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曾在关键词研究中发现，一个时代往往会有一些彼此关系密切的概念同时出现，它们构成了一个关键词的结构，由此深刻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和文化，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地图。在当今学术界，“重识”“省思”“重构”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是构建当代知识地图的重要坐标。它们适应当前语境，创新解读视角，丰富认识维度；它们坚持“发明的传统”，视传统为活在当下并焕发生命力的动态事物而非僵化存在，重新确立与传统的某种联系，为趋近历史真相提供了更多可能。

在此背景之下，《永嘉学派的学术渊源》《鲜卑部落联盟的分期与特征分析》《寡断与掣肘：朝廷决策视角下的同文馆之争》对既往研究史料、契入视角、研究进路进行多方位的突围，对相应的思想史、民族史和政治史进行了重识、省思与重构，实现了多维度、宽视野、系统性的理论探索。

《永嘉学派的学术渊源》一文从永嘉学派学术思想史的维度上对之阐释，突破了狭隘的地域限阈以及对永嘉学派的事功偏见来解读永嘉学术及其发展，重识并重构永嘉学术与传统儒学的学术承继关系、永嘉事功学术思想及其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论文认为，永嘉学派自王开祖开学风之先，而后历经元丰太学九先生引洛学入两浙，郑伯熊、薛季宣中兴永嘉学术以及叶适集大成等几个阶段。在此期间，其学术旨趣由早期的“必竟省以御物欲”转向后期的“必弥纶以通世变”。深入考察永嘉学派的发展，可以得出关于永嘉学术的两个重要论断：其一，永嘉学术代表了儒学在两浙路的最早承继与发展，在其本质上，永嘉学术并非狭隘的地域性学术思想，其兴起与发展所开启的既是浙学发展的新气象，也是两宋以来传统儒家之继承与发展的新气象；其二，永嘉学术的事功思想虽然在薛季宣时代才得以明确，但王开祖、周行己等早期永嘉学者的思想中就已经内蕴了事功的学术取向。尤为值得强调的是，永嘉学术的事功取向并非狭隘的功利主义，它与儒学传统的合“内圣”与“外王”的义利观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永嘉学派的兴起、发展的过程是论

释有宋以来两浙之地社会文化发展以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发展的极重要文化资源，它既生动地展示了浙学在其兴起的文化起点的样态，又从永嘉学术发展的维度描绘了有宋以来传统儒学承继的学术图景。永嘉学术与朱子学、陆王心学的相互辩难也在特定的维度上呈现了当时中国思想史的整体状况，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值得深入开掘的价值进路。

《鲜卑部落联盟的分期与特征分析》一文探讨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鲜卑部落联盟的发展过程，认为鲜卑部落联盟从发展历程上可分为早期鲜卑部落联盟、晚期鲜卑部落联盟和部落联盟国家三个阶段。早期鲜卑部落联盟以一位英雄为中心建立，包括檀石槐部落联盟和轲比能部落联盟，部帅由全体部民选举产生，部落的权力属于全体部民；晚期鲜卑部落联盟以部落为中心建立，包括拓跋部落联盟、乞伏部落联盟、秃发部落联盟和吐谷浑部落联盟，部帅被禁锢在中心部落部帅家族之中；部落联盟国家则是在晚期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的行国，部落联盟的部帅演变为封建君主，加盟部落的部帅则演变为国家官僚。部落联盟是人类跨越文明国家门槛的准备过渡阶段，它的内在形态和进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国家发展的轨迹和属性，对鲜卑部落联盟的研究不仅是对鲜卑早期历史的重识，更对重构整个鲜卑历史发展历程和中古民族融合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寡断与掣肘：朝廷决策视角下的同文馆之争》一文关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这一晚清政治决策的重大事件。既往学界在讨论晚清政治决策时，习惯于以“保守派”“洋务派”等派别之争为视角，而该文不拘泥于成说，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省思的基础上，从寡断与掣肘的角度出发，把争论看成是清廷添设天文算学馆决策过程的一个部分，在此语境下来重识天文算学馆招生受挫的深层次原因，重构对同文馆之争的认知，为大家认知同文馆之争提供一个全新视角。论文认为，由于垂帘听政决策体制存在天然的不足，洋务派和顽固派对王朝中兴所持的理念对立，致使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决策一波三折，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决策体制不健全，既有的体制未得到遵循；清廷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决策中心；招生方案设计不当危及了顽固派的利益，成了决策争论的焦点；奕訢缺乏智囊人物应该具备的素质；慈禧作为皇权的代表，理论上拥有最高的决策权，却缺乏对时局的分析、把控、决断能力；倭仁缺乏处事能力，是不堪重用之才。这一切最终导致洋务派和顽固派在这场决策争论中都没有取得任何好处，同时皇权的威严也遭到了损害。朝廷的决策水平是晚清洋务事业发展的瓶颈，因此从决策角度来考察同文馆之争对研究晚清洋务运动的兴衰也极具借鉴意义。

唯有重新发现，方能趋近本质，进而启示未来。这组稿件，秉承重识、省思、重构的研究进路，对永嘉学派的学术渊源、鲜卑部落联盟的分期与特征分析、朝廷决策视角下的同文馆之争进行研究，为重新理解和解释相应的思想史、民族史、政治史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和富有价值的理论补充。特此推荐，以飨读者！

# 永嘉学派的学术渊源

郑根成

**摘 要:**永嘉学派自王开祖开学风之先,而后历经元丰太学九先生引洛学入两浙,郑伯熊、薛季宣中兴永嘉学术以及叶适集大成等几个阶段。在此期间,其学术旨趣由早期的“必竟省以御物欲”转向后期的“必弥纶以通世变”。深入考察永嘉学派的发展,可以得出关于永嘉学术的两个重要论断:其一,永嘉学术代表了儒学在两浙路的最早承继与发展,在其本质上,永嘉学术并非狭隘的地域性学术思想,其兴起与发展所开启的既是浙学发展的新气象,也是两宋以来传统儒家之继承与发展的新气象;其二,永嘉学术的事功思想虽然在薛季宣时代才得以明确,但王开祖、周行己等早期永嘉学者的思想中就已经内蕴了事功的学术取向。尤为值得强调的是,永嘉学术的事功取向并非狭隘的功利主义,它与儒学传统的合“内圣”与“外王”的义利观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关键词:**永嘉学派;事功;功利;伊川洛学

**作者简介:**郑根成,哲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型政商关系研究”(17JZD008)。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8.03.011

在两宋以来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图景中,永嘉学派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关于永嘉学派的研究著述甚丰。然则,永嘉学术与传统儒学的学术承继关系、永嘉事功学术思想及其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澄清。本文拟在永嘉学派学术史的维度上阐释之,以就教于方家。

## 一、关于永嘉学派学术创始的争歧

关于永嘉学派的学术开创者,学界尚存有争歧,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永嘉学派的开创者是王开祖。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包括南宋著名学者陈谦等人。陈谦指出,王开祖早在庆历(1041—1048)、皇祐(1049—1054)年间就已经在永嘉从事讲学授徒活动:

当庆历、皇祐间,宋兴来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此永嘉理学开山祖也。<sup>[1]803b-803c</sup>

在此四十余年之后,“伊洛儒宗始出,从游诸公(注:指周行己等人)还乡,转相授受,理学益行,而滥觞亦有自焉”<sup>[1]803c</sup>。永嘉许及之亦称:

故永嘉之学,言宗师者首王贤良焉。<sup>[2]</sup>

王开祖在永嘉讲学之时,二程等都尚未以理学称名于世。因此,在整个北宋理学发展史上,

王开祖都属于最早的提倡者之一。全祖望也称王开祖“先生见道最早，所著有《儒志编》，……是时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徕、古灵诸甫起，而先生之言实遥与相应。永嘉后来问学之盛，盖始基之”，并称“永嘉师道之立，始于儒志先生王氏”<sup>[3]</sup>。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认为，永嘉学术的奠基者应是王开祖。今人周梦江虽然认同周行己对永嘉学术的重大贡献，但他认为王开祖才是永嘉学派的创始人<sup>[4]</sup>。

第二种观点认为，永嘉学派的学术开创者是周行己。南宋陈振孙就认为，周行己是“永嘉学问所从出”。他说：

十七入太学，有盛名。师事程伊川。元祐六年进士。为博士太学，以亲老归，教授其乡……永嘉学问所从出。乡人至今称周博士。<sup>[5]</sup>

黄宗羲编撰《宋元学案》时，把周行己、许景衡等人列入永嘉学案之一，而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列入永嘉学案之二。这其实是以学案编撰的特殊方式确立了周、许作为永嘉学派创始人的地位。而周、许二人中，又以周行己对永嘉学派的影响更大。因为他是当时从程颐游学的永嘉士人中唯一曾任温州州学教授者，曾两度在永嘉讲学，时长达八九年之久，对永嘉学术乃至浙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全祖望说：

（洛学）其入浙也，以永嘉周（行己）、刘（安节，安上）、许（景衡），鲍（若雨）数君。<sup>[6]</sup>

又说：

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周行己）尚有绪言。<sup>[7]407</sup>

鉴于《宋元学案》在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它不只提供了宋、元两代较为详尽的思想史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思想评价标准以及思想史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所创构而成为其后思想史研究的典范。因此，《宋元学案》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周行己作为永嘉学派的开创者就几乎被视为定论。

第三种观点认为薛季宣是永嘉学派的创始者。包括吕振羽、侯外庐等人都认为：薛季宣是永嘉学派作为“事功学派”的创始人<sup>[8-9]</sup>。在这种解读中，学者们强调薛季宣是永嘉学派中首先明确反对空谈义理，并以事功阐释义理，强调要研究国计民生之学的人。薛季宣说：“求经学之正，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sup>[10]</sup>，又“告学者则曰：‘毋以徒诵语录’”<sup>[11]</sup>。其后，经陈傅良、叶适的继承与发扬，永嘉学术便以“事功学”称名于世。故四库馆臣说：

朱子喜谈心性，而季宣则兼重事功，所见微异。其后陈傅良、叶适等递相祖述，而永嘉之学遂别为一派。<sup>[12]625</sup>

其实，上述三种关于永嘉学派开创者的观点与其说是在阐释永嘉学派的创始问题，倒不如说是在分析永嘉学术在三个不同学术发展阶段的学术旨趣与学术特质，它实质上揭示了人们关注永嘉学术的三个不同方面。视王开祖为永嘉学术的开创者，强调的是王开祖乃最早开永嘉学术风气之人。视周行己是永嘉学派的学术开创者，强调的则是周行己创建了一个有自身学术特色的学术流派。而视薛季宣为永嘉学派的创始人，强调的则是他明确了永嘉学派的事功取向。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关于永嘉学派开创者的分析也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永嘉学派发展的学术演绎进程，即从学术气象的奠基到学派的创立再至学术风格的确立这一历史进程。

## 二、永嘉学派的发展——从兴起到集大成的学术缘起与学术旨趣

作为一个有自身独特的致思进路与学术特色的学术流派,永嘉学派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 (一) 学术风气的始倡阶段

北宋早期,两浙路尚没有在文化史或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更遑论永嘉之地了。然而,两宋时期,两浙之地却迅速发展出了恢宏的浙学气象,并在南宋后期及元、明二代融汇了象山心学、朱氏闽学而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中心。这种后发的学术强势得益于两浙路自两宋以降的学术风气的涵养。北宋初期,两浙路的学术虽未成气象,但亦有所成长。对两浙路学术风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三人了,他们宣讲理学早于二程,故全祖望称他们为“濂洛前茅”。黄百家则说:

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sup>[13]</sup>

三先生中,又以胡瑗对于奠定两浙路学术风气的贡献最著:宋明宗明道、宝元年间,范仲淹邀胡瑗到浙西平江府(今苏州)南园郡学讲学;庆历年间,胡瑗又应滕宗谅之邀到湖州州学讲学。讲学期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胡瑗办学成效卓著,提出了著名的“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sup>[14]</sup>的观点,并开创了“苏、湖教法”,促进了当时地方政府的办学积极性。受其影响,两浙各地兴办了不少学校,培养了一批有志于理学的人才,著名者如滕元发、顾临、徐中行等。永嘉王开祖、丁昌期等人都是受胡瑗影响而立志于儒学。王开祖本人并非宋代大儒,他的著述多已散佚,反映其学术思想的《儒志编》则是由其门人默记而成的学术笔记性质的文存,其中偏误必是不少。王开祖在其学术思想体系尚未完全建构起来时就英年早逝,因此,了解王开祖的人多为其同时代的学人,后世学人更多地只能根据关于王开祖的零散记载来了解他的学术思想、推断他对于永嘉学术的影响了。尽管如此,人们仍大多认同王开祖开永嘉学术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并视其为永嘉学术最早的奠基人:一方面,王开祖在永嘉一带的讲学授徒活动培养了一大批永嘉学术乃至浙东学术后进;另一方面,他的讲学活动带动了当地的学术风气,并引领着永嘉之地逐渐从地处蛮荒的文化僻夷处所走向近代浙东学术的最前沿阵地。

### (二) 洛学入浙与永嘉初创阶段

永嘉学派的得名乃是源于该学派传承者多为永嘉籍人士,在这个意义上,“永嘉”所强调的是其学者群体的地域性特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些学者会把王开祖视为永嘉学术的先行者。然而,实际上,作为一个有其自身深刻学术思想内涵,且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较大的学术流派来说,“永嘉学术”并非地域意义上的永嘉之学。一方面,永嘉之学并非是狭隘的区域性理论研究,它直接承继当时伊川洛学的主流思想并有所创进,从而开启了浙学的学术景观,仅仅局限在永嘉之地是无法得窥永嘉学派的学术真谛的。另一方面,永嘉学派的著名思想家们虽多为永嘉籍士人,但其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永嘉之地。周行己、许景衡等人就曾问学于程颐,他们交游甚广,扩大了永嘉籍学人在时为我国学术中心的北方学界的影响。而永嘉学派中兴的代表人物郑伯熊、薛季宣等人的学术与交游活动也不局限永嘉之地:郑伯熊曾任福建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薛季宣则至蜀地为四川制置使萧振的幕僚。因此,永嘉学术生长的历程其实代表了当时两浙之地的

学术由边缘走向中心的“逆袭”历程。之所以说是“逆袭”，乃是因为，永嘉学术兴起之前，两浙之地学者人数较少且其影响也较小；而永嘉学派兴起之后，两浙之地在较短时间内涌现了一大批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大家，并催生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上学术最为繁荣的时代之一。

后来的学者们大多倾向于把北宋以来的两浙学术看成是浙学的初创时期，而这一学术初创又是以永嘉人士为主体的学者们承继洛学并有所发展而来。这其中，首屈一指者当为“元丰太学九先生”了，清末孙诒让曾指出：

宋元丰间作新学校，吾温州太学元中、沈彬老躬行、刘左史安节、刘给谏安上、戴教授述、赵学正霄、张学录炜、周博士行己，及横塘许忠简公景衡，同游太学。以经明行备知名当世。自蒋赵张三先生外皆学于程门，得其传以归，教授乡里。永嘉诸儒所谓“九先生”者也。<sup>[15]</sup>

九先生中，除张炜、赵霄、蒋元中三人之外，其他人都“从程氏游”。“张氏、赵氏、蒋氏疑未见伊川者，盖私淑也。”<sup>[7]421</sup>全祖望还曾考证出鲍若雨、潘闵、陈经正、陈经邦等人也曾“从程氏游”。这即是说，当时已经有一批永嘉籍士人北上问学，正是他们繁荣了永嘉的学术气象。

以周行己、许景衡等人为代表的永嘉籍学人努力好学，他们既向胡瑗、程颐等人求学，又广结学缘，永嘉学人群体逐渐被伊洛之学的追随者们所认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永嘉籍学人之所以为人们认识，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来自同一地理区域，他们在共同的游学与学术旨趣上所表现出的某种同质性特点也使得他们成为当时士人群体中独特的群体。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问道洛学之后又或早或晚地回到永嘉，在“乡野”开馆授课、设帐布道，成为洛学在两浙路的最重要继承人与传播者。虽然他们自身在思想史上的影响有限，但他们的教学活动既为永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后进，也引领了永嘉之地的学术趣向。可以说，正是他们开创了永嘉学派，何炳松把元丰太学九先生承洛学而创永嘉的时期称之为永嘉学派的“草昧时代”<sup>[16]150</sup>。

### （三）郑伯熊、薛季宣与永嘉中兴

元丰太学九先生之后，南宋绍兴年间，永嘉学术一度几近衰歇。至于当时永嘉学术衰歇的原因，史书记载有限。有限的文献记载表明，秦桧及当时的党争或许是永嘉学术衰歇的重要原因。1132年8月，秦桧被罢相后曾寓居温州，后又“知温州”（1135年）。其后，1138年，秦桧再度出任宰相。秦桧居温州及任宰相期间，永嘉学风有所败坏，永嘉学术亦无所进。究其原因，当时宰相在士人选拔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史载：

乙酉，秘书省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叶谦享面对言：“陛下留意场屋之制，规矩一新，然臣犹有虑者……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摒弃……愿诏有司，精择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说，使学者无偏曲之弊，则学术正而人才出矣。”上曰：“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诚为偏曲，卿所言极当。于是降旨行下。”<sup>[17]434c-434d</sup>

叶谦享与高宗的这段对话表明，赵鼎与秦桧为相时，他们所推崇的学问不同，但他们都只根据自己的学问偏好选弃士人。秦桧在士人任用中，就大肆“引用州人，以为党助”<sup>[17]19b</sup>。据史料记载，秦桧的许多乡党“凡乡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攀援，其势炎炎，日适月擢，无复程度”<sup>[17]19b</sup>。

全祖望在论及秦桧对当时永嘉学术的影响时说：

方秦桧擅国，禁人为赵鼎、胡寅之学，而永嘉乃其窝里，后进为所愚者尤多。<sup>[7]429</sup>

叶适痛心指出:

方秦氏以愚擅国,人自识字外,不知有学。<sup>[18]415</sup>

在其给郑伯英文集所作的序中,叶适又说:

余尝叹章、蔡氏擅事,秦桧终成之,更五六十年,闭塞经史,灭绝理义,天下以佞谀鄙浅成俗,岂惟圣贤之常道隐,民彝并丧矣。<sup>[18]216</sup>

当是时,起而复振永嘉学术的首先就是郑伯熊。在秦桧禁人为赵鼎、胡寅之学,洛学濒于灭绝之际,郑伯熊以振兴洛学为己任,与其弟郑伯英在闽中印行二程之书,设立书院,并亲自讲授。史载:

绍兴末,伊洛之学几息。永嘉九先生之绪言,且将衰歇。郑伯熊与其弟伯英并起,首雕程氏书于闽中。由是永嘉之学守郑氏。乾淳之间,永嘉学者连袂成帷,然无不以先生兄弟为渠率。吕成公尤重之。<sup>[7]429-430</sup>

纪昀则说:

伯熊邃于经术,绍兴末伊洛之学稍息,伯熊复出而振之。刘埙《隐居通义》亦谓:伯熊明见天理,笃信固守,言与行应。盖永嘉之学自周行己倡于前,伯熊承于后,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等皆奉以为宗。<sup>[19]</sup>

薛季宣是复兴永嘉学术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叶适说:

昔周恭叔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绝,俨然如醉忽醒,梦放觉也,颇益衰歇,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千古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竞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

薛士隆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万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铢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根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sup>[18]607</sup>

叶适的这一记载表明,郑伯熊、薛季宣都是绍兴末期复振永嘉学术的重要人物。但在学术旨趣方面,郑、薛二人其实并不完全一致,郑伯熊所代表的是永嘉学术作为洛学在两浙之地的继续发展,其所继承的是二程洛学统纪。当周行己以来的洛学在永嘉之地的发展陷入到“颇益衰歇”的困境之时,郑伯熊起而“明见天理”“笃信固守”,完好地承继了洛学的基本学术趣向。薛季宣虽然在师承关系上仍属洛学一脉,但他复振永嘉学术则更多地带有基于反思而重构的特点,他反对那些空谈性命而不通古今事物之变的“自附于道学者”,主张“就事上理会”,并强调学术应能“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sup>[20]429-430</sup>。吕祖谦指出,薛季宣的学问呈现出了与洛学异趣的方面:

既尽晚出者或骛于空无,不足以涉耦变,识者忧之,而公(按:薛季宣)之学,既有所授,博揽精思几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经地志,断章缺简,研索不遗。过故墟废陇,环步移日,以验其迹,参绎融液,左右逢原。凡疆里、卒乘、封国、行河,久远难分明者,听其讲画,枝叶扶疏,缕贯脉连,于经无不合,于事无不可行。<sup>[12]622</sup>

又说:

(薛季宣)于世务三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其

比……其所学确实有用。<sup>[21]92</sup>

薛季宣之后，永嘉学术遂而确立了“弥纶以通世变”的事功学术趣向，其重事功而通世变，强调实事实功、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使得永嘉学术由此别开生面，自成一家。薛季宣的学问由其门人陈傅良等继承进而光大之，并经由叶适而终得大成。

#### （四）叶适与永嘉学派的集大成

已有的关于永嘉学派的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叶适是永嘉学派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一般来说，叶适被视为永嘉学派的学术代表乃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叶适明确阐明了永嘉学派学术发展的脉络，并在这种学术脉络的确立中树立了永嘉学派作为一个学派的基本面相。一方面，叶适梳理了从以周行己为代表的元丰太学九先生以来，永嘉洛学弟子与再传弟子的学术继承关系，即二程传周行己，再传郑伯熊后由薛季宣传陈傅良的过程<sup>[22]</sup>。在这一学术继承关系中，根据永嘉学派在不同时期的学缘结构与学派发展，明确把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与陈傅良等四人视为永嘉学派的学派创始与最重要承继者。另一方面，叶适明确了永嘉学派发展的学术特点。叶适把自周行己而至郑伯熊的永嘉学术的特点界定为“必竞省以御物欲”，而把薛季宣以后永嘉学术的特点界定为“必弥纶以通世变”。这样，叶适就明确了永嘉学术特点鲜明的两个学术向度。在这个意义上，叶适是永嘉学派的发现者。

其二，叶适明确倡明了永嘉功利学说的立场与要旨。叶适从两个进路来诠释永嘉功利学说。一方面，叶适从永嘉学术承继儒学脉统的进路上阐释永嘉学术的基本旨趣，即他所说的要以“吾一以贯之”的态度对待永嘉学派的学术取向。如前文所述，叶适认为永嘉学术旨趣经历了由“必竞省以御物欲”而至“必弥纶以通世变”的变化，但在他本人的学术思想中，他并不认为这意味着永嘉学术在其发展中经历了某种学术转型。叶适站在儒学传统的角度看待这种变化，并强调这种变化所代表的其实是永嘉学术合“内圣”与“外王”的学术取向与实践追求。也就是说，叶适把“必竞省以御物欲”解读为永嘉学术的“内圣”取向，而把“必弥纶以通世变”解读为永嘉学术的“外王”取向。叶适的这种解读揭示了永嘉学术与传统儒家精神的一致性，进而揭示了永嘉学术所代表的其实是传统儒家学说（这一传统学说在当时的学术形态实则为理学）在两宋永嘉之地的发展。另一方面，叶适在论及“功利”时，强调“功利”与“道义”并不是互相冲突的对立面，而是互为表里、体用的两者。相反，绝对强调“义”而片面否弃“利”的思想倒有陈义太高的嫌疑：

“仁人正谊不谋于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sup>[23]</sup>

其实，叶适等人强调不虚义，不弃功的立场，其强调的是义利相和，学以致用。叶适本人尤为反对南宋后期道学末流空谈、虚诞的学风，认为：“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政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sup>[21]178</sup>。故此，黄宗羲按曰：“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sup>[20]429-430</sup>

从功利学说的辨义与伸张角度看，叶适虽不是永嘉功利学术的始创者，但他阐明了永嘉事功学术与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内在关联，并明确了事功思想的学术内涵与实践旨趣，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成为永嘉学派的理论体系构建者。

另外，叶适以文章著称于世，作为永嘉学子，其行文彰显了地处僻远的永嘉学人承继学统的



文化担当与责任感:

余观自古尧、舜旧都,鲁、卫故国,莫不因前代师友之教,流风相接,使其后有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远下州,见闻最晚;而九人者,乃能违志开道,蔚为之前,岂非俊豪先觉之士也哉?然百余年间,绪言遗论,稍已坠失,而吾侪浅陋,不及识知者多矣。幸其犹有存者,岂不可为之勤重玩绎之欤?<sup>[18]598</sup>

在此,叶适强调了虽然温州地处偏远,但只要“勤重玩绎”,永嘉学派也能象“尧、舜旧都”“鲁、卫故国”之地一样流风相接,实现儒学脉统的传承。在这个意义上,叶适以其文化担当与责任呼吁而成为永嘉学派的学术代表。

### 三、永嘉学术渊源的学术史意义

在对永嘉学派的学缘与学术旨趣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永嘉学术史的两个重要论断。

#### (一) 永嘉学术代表了理学在两浙路的最早承继与发展

永嘉学术的最早奠基者无疑是王开祖。但永嘉学派作为一个有自身学术特色与影响的学术流派,则是由周行己所开创的。从传统儒学思想史的维度来看,不论是王开祖,还是周行己以至于之后的叶适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都有着共同的“理学”渊源。王开祖的学术思想虽然已经较难考证,但从他与弟子们论学的内容看,王开祖的思想与王安石思想较为接近<sup>[4]</sup>。他对待儒学的立场是:“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吾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非有所见而能为是,所恨僻处海隅,不能广传于天下。”<sup>[24]</sup>很显然,王开祖视复兴儒学之道为己任,永嘉陈谦因此称永嘉学术为“永嘉理学”,并称王开祖是“永嘉理学开山祖”!由此观之,永嘉学术在其源生处就有着承理学而发展的学术旨趣。而理学实为儒学在当时的现实学术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永嘉学术一开始就有承继儒学而发展的学术旨趣。

自元丰太学九先生而至叶适,永嘉学术史各个阶段的重要学者大多师承伊川洛学一脉,这进一步表明:永嘉学派学术发展所代表的其实是二程理学在当时两浙路的继承与发展。吕氏婺学亦宗二程理学,它同样代表了二程理学在两浙路的承继与发展,但永嘉学术在王开祖开学风之先及元丰太学九先生引洛学入两浙方面都要远早于婺学在两浙路的发展。永嘉学术之前,两浙路亦未曾有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的建构,因此,永嘉学术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儒学——其当时的学术形态即为理学——在两浙路的最早承继与发展。在其本质上,永嘉学术并非狭隘的地域性学术思想,其兴起与发展所开启的既是浙学发展的新气象,也是两宋以来传统儒家之继承与发展的新气象。问题在于,在许多学者的视界中,永嘉学派的这一学术特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朱子学的理学或儒学特质,并在其对立面的意义上指陈永嘉学术的非理学特质。事实上,有宋以来,二程理学在南方的发展是循三条进路演绎的:一是朱熹理学及其后进;二是永嘉事功学派及后来包括了永嘉学术在内的浙学发展;三是象山心学与阳明心学的融汇及其后学发展。全祖望在编撰《宋元学案》时就明确阐明了永嘉学派的洛学特质:

永嘉自九先生而后,伊川之学统在焉,其人才极盛。<sup>[20]50</sup>

很明显,全祖望不仅仅是肯定了元丰太学九先生所承继的是伊川洛学,同时也明确了九先生之后的郑伯熊而至叶适等人的学术所承继的仍然是伊川洛学统纪,即所谓永嘉有伊川学统。全祖望特别强调:“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sup>[25]214</sup>而黄百家也指出:“永嘉之学,

薛、郑俱出自程子。”<sup>[25]216</sup>

张九成也把元丰太学九先生的学术解读为圣学（程学）在温州的发展：

永惟仙里，圣学盛行。元承、元礼、少伊诸公，表见于朝廷，而彦昭、恭叔、元忠之流，力行于太学。渡江以来，此学尤著，精深简妙，深入洙泗堂壺中。其至矣哉！<sup>[26]</sup>

事实上，除了元丰太学九先生之外，鲍若雨等人亦曾及于伊川之门。由此不难看出，永嘉学术的繁荣是以伊川洛学在当时两浙路的传承为契机的。关于这一点，何炳松强调：“初辟浙东史学之蚕丛者，实以程颐为先导。程氏常说本以无妄与怀疑为主，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最为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读古书，多识前言往行，并实行所知，此实由经入史之枢纽。传其学者多为浙东人。故程氏虽非浙人，而浙学实渊源于程氏。”<sup>[16]自序：3</sup>

## （二）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承继并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

永嘉学术的事功思想虽然是自薛季宣之后才明确化，然而，自王开祖的学术思想就已经内蕴了事功取向。王开祖强调个体不应该以其自身道德的涵养为满足，而必欲将其内在德性外向展现于经世事业的开辟之中；他以阐明尧舜之道为己任，重视经史研究，强调学问的现实有效性及其政治价值，以开辟经济世务的“外王”事业。他说：“我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sup>[24]</sup>

洛学兴起之后，学者竞相师从，永嘉周行己、许景衡等人都师事二程，他们是最早将洛学传入两浙路的一批学者。但王开祖重视经史研究并要求将心性追寻表达为经世事业的基本理念，在周行己等永嘉后学的学术精神中仍有所体现。周行己强调人与天下万物为一体：“人者位乎天地之间，立于成世之上，天地与吾同体也，万物与吾同气也。”<sup>[27]</sup>因此，人在以“仁义礼智根于心”的前提下应当将这种内在的道德“措于事业”，体现于现实的社会与生活实践之中。

薛季宣同样深受洛学影响，但他却超越了道德性命的义理纠缠，而倡导一种更为平典质朴、以古代制度考订为手段的学问，以求在现实政治事务的合理措置中收到其价值的实效。正是这一新的治学途径与目的的倡导，明确了永嘉学术的事功取向，并开辟出了陈傅良、叶适一派的所谓“事功之学”；也正是自薛季宣开始，潜存于王开祖、周行己等人思想之中的经济世务的学术精神获得了充分显化，从而形成了以古代典章制度的研究来表现其事功思想的基本特色。

陈傅良承继了薛季宣的学术精神且更有创进。陈傅良少谈道德性命，而萃其精力于古代经制研究，其细致的程度，至于“铢称镒数，各到根穴”。但这种古代典章制度的研究仅仅是手段，其目的则是要通过对古代政治与其时代关系的切实研究，借鉴古代政治的成功经验，为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寻找出路。藉古代经制的研究而制定出切合于当前实情的治国方略，施之实用，实现事功，从而增进全社会的普遍福利，陈傅良所继承的这种学术精神，恰是永嘉学术在当时之所以被视为“功利之学”的基本原因。由此不难看出，有宋以来的永嘉事功学术其实是有其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彰显了永嘉学派本身作为一个学派的一致性。更为重要的是，永嘉学术的事功思想与传统儒家的义利观是完全一致的。一方面，一如叶适所主张的，永嘉学术前期阶段“必竞省以御物欲”的学术思想所代表的是永嘉学术的“内圣”取向，而后期阶段“必弥纶以通世变”的学术思想则代表了永嘉学术的“外王”取向。这即是说，永嘉学术的基本精神与儒家传统合“内圣”与“外王”义利精神有着完全一致的学术取向与实践追求。另一方面，永嘉学派的“功利”，乃是“公利”，而非“私利”。“南宋的事功之学决不是道学家们所指责的那样‘在利欲胶漆盘中’，因为他们所提倡的事功主要是指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公利，公利本身便体现道德。”<sup>[28]</sup>人们

要么混淆了“事功”与“功利”，要么把永嘉学派的“功利”世俗化了，但“事功”与“功利”之间的区别却是显明的：

永嘉之学，倡自吕祖谦，和以叶适与陈傅良，遂于南宋诸儒别为一派。朱子颇以涉于事功为疑。然事功主于经世，功利主于自私，二者似一而实二，未可尽斥永嘉为霸术，且圣人之道，有体有用，天下之势，有缓有急。陈亮《上孝宗疏》所谓“风弊不知痛痒”者，未尝不中薄视事功之病，亦未可尽斥永嘉为俗学也。<sup>[29]</sup>

关于永嘉学派的事功主义，朱熹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说：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sup>[30]</sup>

又说：

浙学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吕子约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当时传授师说，何故乖讹至于此，深可痛恨！<sup>[31]</sup>

在这里，朱熹所谓的“浙学”是既包括了以薛季宣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也包括了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等。鉴于朱熹在南宋思想界“一字不敢异同”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后世学人大多以朱熹的定性与评价看待永嘉学派。但永嘉学派本身的学术发展却表明，朱熹的评价实则有所偏误，是值得商榷的。

在某种意义上，朱熹的批判引导了宋、元时期关于朱子学与永嘉学术的学术旨趣异质性的研究取向。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永嘉学术与朱子学在儒学维度上的一致性。在论及二者与儒学的关系时，何隽<sup>[32]</sup>就提出：“对照于孔孟的整个思想，我们只能说浙东事功学偏重于儒家传统中的政治思想的传承，从而表现出与程朱哲学的兴奋点的相异，而无法下事功学的思想背离了整个儒家传统的论断。”又说，永嘉学派继承了儒家“开物成务”的传统。杨太辛<sup>[33]</sup>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永嘉诸儒发轫于伊洛理学，致力于《周礼》制度，由虚返实，通经致用，而非一无傍依的事功之学。因此，‘事功’不足以赅浙学。三是学重制度名学，有人以此作浙学为事功之学的论据。《象山语录》有一条陆学门人对朱陆的评价：‘或谓先生（指陆九渊）之学，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学，是名物度数，形而下者。’这从另一方向反证了浙学与朱学异中有同：浙学重经制事功而于性命义理，朱学重理气心性而不忘制度名物。概言之，浙学言事不离理，朱学言理不离事；浙学重事功而不能以事功限浙学，朱学崇性理而不能以虚无责朱子。这就是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陈国灿<sup>[34]</sup>虽然将永嘉事功学派的学术旨趣定性为“反理学”，但他又提出，就其实质而言，事功学派与理学乃是当时不同儒学流派之间的分歧。事功学者批判理学，不是要否定儒学理论，而在于使儒学朝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同当时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实效，恢复和增强其活力。

不难看出，一旦突破了狭隘的地域限阈以及对永嘉学派的事功偏见来解读永嘉学术及其发展，那么，永嘉学派的兴起、发展的过程就成为诠释有宋以来两浙之地社会文化发展以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发展的极重要文化资源。它既生动地展示了浙学在其兴起的文化起点的样态，又从永嘉学术发展的维度描绘了有宋以来传统儒学承继的学术图景。永嘉学术与朱子学、陆王心学的相互辩难也在特定的维度上呈现了当时中国思想史的整体状况。可惜的是，虽然部分学者注意到了永嘉学术研究的这一进路，并有所学术建树，但整体地看，学界对这一有重大学术意义的研究进路的关注尚显不够，在这一进路继续深入开展永嘉学术研究是极有必要的。

# 参考文献：

- [1] 陈谦. 儒志学业传 [M] //永瑯.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96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2] 孙诒让. 温州经籍志：上 [M]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温州文献丛书.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65.
- [3] 黄宗羲. 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全氏补本）[M] //沈善洪，吴光. 黄宗羲全集：第 3 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319.
- [4] 周梦江. 永嘉学术开创者王开祖——宋代浙学通论之一 [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2）：44-50.
- [5]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七 [M]. 徐小蛮，顾美华，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15.
- [6] 黄宗羲. 宋元学案：卷二十九·震泽学案（全氏补本）[M] //沈善洪，吴光. 黄宗羲全集：第 4 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309.
- [7] 黄宗羲. 宋元学案：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M] //沈善洪，吴光. 黄宗羲全集：第 4 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8] 吕振羽. 论叶适思想——中华书局辑刊集序 [M] //叶适. 叶适集. 北京：中华书局，1961：序 3.
- [9]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 宋明理学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49-450.
- [10] 薛季宣. 浪语集：卷二十五 [M] //永瑯.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9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395c.
- [11] 陈傅良. 止斋集：卷五十一 [M] //永瑯.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0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907a.
- [12] 薛季宣. 薛季宣集 [M]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温州文献丛书.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25.
- [13] 黄宗羲. 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M] //沈善洪，吴光. 黄宗羲全集：第 3 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108.
- [14] 胡瑗. 松滋儒学记 [M] //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第 15 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5：18656.
- [15] 孙诒让. 温州经籍志：中 [M]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温州文献丛书.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810.
- [16] 何炳松. 浙东学派溯源 [M]. 长沙：岳麓书社，2011.
- [17]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M] //永瑯.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27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8] 叶适. 水心文集：卷二十一 [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 [19]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壹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326-327.
- [20] 黄宗羲.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氏原本，全氏补定）[M] //沈善洪，吴光. 黄宗羲全集：第 5 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21] 周梦江. 宋元明温州论稿 [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 [22] 陆敏珍. 宋代永嘉学派的建构 [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90-291.
- [23] 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234.
- [24] 王开祖. 儒志编 [M] //永瑯.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96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783b.
- [25] 黄宗羲. 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黄氏原本，全氏修定）[M] //沈善洪，吴光. 黄宗羲全集：第 5 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26] 张九成. 横浦集：卷十八 [M] //永瑯.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38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419c-419d.
- [27] 周行己. 浮沚集：卷四 [M] //永瑯.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3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628a.
- [28] 潘富恩，刘华. 论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 [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5）：49-54.
- [29] 永瑯. 四库家藏·子部典籍概览：三 [M]. 张新奇，宋建勋，李智勇，整理.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863.
- [30] 黎靖德. 朱子语类：第 8 册 [M]. 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2967.
- [31] 朱熹. 晦庵集：卷五十 [M] //永瑯.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44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489b.
- [32] 何隽. 南宋浙东事功学与儒学传统 [M] //杨渭生. 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385.
- [33] 杨太辛. 浙东学派的涵义及浙东学术精神 [J]. 浙江社会科学，1996（1）：90-95.
- [34] 陈国灿. 论南宋事功学派的反理学思想 [J]. 安徽史学，1998（3）：19-25.

## The Academic Origin of Yongjia School

Zheng Gencheng

**Abstract:** Yongjia school was originated by Wang Kaizu and experienced several phases, 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of Luo school to the east and west of Zhe region by nine scholars in the supreme college during the Yuanfeng Reign, the resurgence of Yongjia school by Zheng Boxiong and Xue Jixuan, and the epitomization by Ye Shi. During this period, its academic focus shifted from the early “controlling the desire for materialism” to the later “know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hrough the thorough study of Yongjia school, two important conclusions can be reached: first, Yongjia school represents the earliest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east and west of Zhe region. Essentially, it is not a shallow regional academic school. Its rise and development initiate the new look of Zhe school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since the two Song Dynasties; second, though the Shigong idea was made clear in Xue Jixuan time, ideas of early Yongjia scholars like Wang Kaizu and Zhou Xingji had already embodied this academic orientation. What needs more emphasis is that the Shigong orientation is not materialism, but rath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tion of interests combining “internal saints” and “external kings” in Confucian tradition.

**Key words:** Yongjia school; Shigong; materialism; Luo school in Yichuan

(收稿日期: 2018-03-14; 责任编辑: 陈鸿)